

数字时代高校外语教材研究的 自传式叙事范式

杨 港 彭 楠*

(山东大学, 济南, 250100; 黑龙江东方学院, 哈尔滨, 150066)

摘要:本文分析了数字时代高校外语教材编写、使用和研究的过程, 分别从编写者、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视角, 对外语教材编、教、研过程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展开讨论。本文采用自传式叙事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于作者的事件回忆录, 总结了对编写、使用和研究教材的思考, 基于自传式叙述讨论教材编写与教材使用的对接、教材新形态与教学新常态的对接以及信息技术常态化对外语教材编写、教学和研究的影响等, 为教材在数字时代高校外语教学中的有效应用提供参考和建议。

关键词:教材使用; 自传式叙事研究; 数字时代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21-(2021)02-0096-10

[doi 编码] 10.3969/j.issn.1674-8921.2021.02.009

1. 引言

教材是高校外语教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外语教材的建设(刘道义 2020; 张雪梅 2019)、编写(李思龙 2017; 张青妹 2015)、出版(饶国慧 2020; 王玲 2018)、评价(杨敏、侍怡君 2020; 郑晓红 2018)等研究广受关注。教材使用决定外语教材价值是否得以实现(安桂清 2019), 而教材使用的相关研究仍显不足(杨港 2020: 15-16)。

国内外语教材使用研究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教材使用的取向, 俞红珍(2005)和李学(2008)认为“教教材”“用教材教”和“不用教材教”等教材使用取向折射了“材料式”和“圣经式”两种不同的教材观,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并不构成教学中的对立范畴, 教学中应当依据教材本身情况和教师专业的发展水平合理使用教材; 二是教材“一次开发”“二次开发”甚至“三次开发”的实施, 如邱

作者简介: 杨港, 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电子邮箱 yanggang@sdu.edu.cn

* 彭楠(通信作者), 黑龙江东方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外语教材编写与评价。电子邮箱: pengnan1984@126.com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时代大学英语教学模式重构研究”(编号 17BYY102)的相关成果。

引用信息: 杨港、彭楠. 2021. 数字时代高校外语教材研究的自传式叙事范式[J]. 当代外语研究(2): 96-105.

德乐(2009)用教材的“一次开发”“二次开发”和“三次开发”分别指代学科课程专家、教师和学生教材的组织与加工,并特别指出,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经验、知识基础和对时代、社会的感受对教材进行“三次开发”体现了“材料式”和“过程式”教材观,认为教材的价值是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媒介、资源、话题或切入点,对教材的开发才是教学的真实过程。随着外语课堂“学生主体”特性日益突出,学生成为教材使用的直接参与者。为此,曾家延、崔允漷(2019)建议从以教师为主体的教材使用研究向学生主体方向发展。国外对教材使用的研究更加重视将教材同教学方法、学习者、教学目标、目标语、教师的个性与风格保持最佳一致性(the optimal congruence),如 McGrath(2002)、Saraceni(2003)、McDonough 和 Masuhara(2012)分别探讨了教师改编教材的目标、原则和步骤以及学生能动性的发挥。同时,新媒介、新技术与教材使用结合的研究也纷纷涌现,如 Reinders 和 White(2010)、Motteram(2011)、Kervin 和 Derewianka(2011)关注的就是教材信息传递和教材使用中的技术手段,验证了技术和资源驱动的教材更适合以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语言教学。

综合分析,国内外教材使用研究均聚焦使用行为和效果,但对教材使用意识的探讨相对薄弱,导致我们对外语教师使用教材资源的理解不够。本研究采用叙事研究方法收集数据,研究高校外语教师作为教材编写者、使用者和研究者对教材资源的使用理念和策略,以期为教材的编写、使用和教师教学能力发展等提供参考。具体来说,本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

- (1)作为编写者和使用者,教师对教材资源的使用理念和策略有何不同?
- (2)影响教师使用教材资源的因素有哪些?

2. 研究方法

以往的外语教材使用研究主要采用问卷法、访谈法和课堂观察法等收集数据,虽然涵盖范围更广,也能较详实地描述教师的教材使用行为并归纳其总体特征,但对教材使用行为所折射的教学信念、影响因素的深度挖掘有限。本文采用自传叙事研究的方法,描述第二作者作为教材编写者、使用者和研究者三个角色的经历。叙事研究是以自己或他人的故事作为研究内容和对象,以讲述、倾听并反思这类故事作为主要研究形式的一种质性研究范式。自传叙事研究从内部人士视角出发,能够深入个人的经历,提供现象和经历的内部人士观点(Pavlenko 2007)。本文以自我叙述故事和自我反思经历为主线,通过叙事框架构建和主题式数据分析考察当前高校外语教师教材使用的过程和成效。

叙事框架为自传叙事者提供了结构和内容的指南,其持续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引导为有效降低自传叙事研究的主观性做出贡献;同时,作者反复进行自我反思并对数据进行批判性讨论和多角度验证,尽可能提升自传叙事研究的严谨性。叙事框架以第一人称开头的提示语串联,基本内容中除个人信息、学校政策和课程要求之外主要涵盖以下三个主题(杨港 2020):(1)教材使用意识;(2)

教材使用策略;(3)教材使用效果。叙事框架提示语举例如下:

- (1)我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会思考教材中的()部分是否可以并且如何用于()方面的教学。
- (2)我在进行()方面的教学时会不由自主地回顾编写教材时所做过的()设计的初衷。
- (3)如果有机会重新编写这套教材,我将对()方面进行改进,这些改进会带来()的效果。

3. 外语教材使用:编写者、教师的观点

3.1 作为编写者:把教学要素融入教材设计,教材是教学方法创新的显示器

笔者对大学英语教材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整理,发现了教材比较陈旧、教材的主题没有时效性、教材内容难度偏大等问题。同时,通过学生反馈,笔者发现教材语篇内容晦涩、习题过多、设计不美观等问题。了解了教师和学生的反馈之后,笔者又进一步对出版社提供的样书进行了筛选,仍没有发现适合的教材。于是,笔者所在学校的骨干教师同来自其他几所高校的教师一起开始编写新教材。

《21世纪大学英语口语教程(初、中级)》是笔者编写的一部“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编写教材前,笔者在不同高校进行了调研,了解各高校大学英语口语课时安排和非英语专业学生对于英语口语学习的需求。基于调研结果,笔者将每本教材的单元数缩减为八个单元,根据话题难易程度确定初级和中级的单元主题。调研发现,学生的普遍需求是能够表达自己观点,在四、六级口语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因此,笔者以学生需求为基础,以提高学生英语口语表达能力为出发点,将每单元设计成四个模块,分别为准备活动、产出活动、英语语言应用和拓展阅读,遵照“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指导原则,重点编写语言操练和实践等内容。

在确定编写的框架和主要原则后,笔者参照《大学英语教学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和《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以下简称《量表》)进行示例单元的编写设计,具体活动的编写按照《量表》口头表达能力的六个方面设计口语任务。

首先,根据《指南》的具体要求,笔者将每单元准备活动的第一个模块确定为 Culture Base。从调研结果来看,学生比较关注与中外文化相关的话题,因此确定第一个模块为文化基地模块,着重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增强学生对中外文化异同意识。当学生想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常因词汇匮乏无法顺利进行,因此,第二个模块确定为 Language Base,提供了与单元主题相关的单词、短语和句型,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口语任务。

其次,会话是能够有效提高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活动,因此,每单元第二部分的产出活动包括三个环节。其中,Dialogue 旨在让学生根据所给的情景和辅助词汇进行实际对话练习。Writing and Talking 根据二语习得特点,采用头脑风暴的形式,引导学生循序渐进地将所要表达的意思结构清晰、逻辑缜密地呈现出来。Practical Writing and Speaking 将课堂学习延伸到真实语境,帮助学

生在真实情景中应用英语。

再次,考虑到不同层次高校的师生可对教材进行二次或三次开发,教材本身应该提供可供开发的素材,每单元第三部分的英语语言应用模块进行了个性化的设置。比如,《初级口语教程》包含的习语、影视片段、文化畅谈三个部分提供了地道的英语习语使用范例、生动的英语影视片段和中国特色节日的介绍;《中级口语教程》除提供地道的英语习语和英语影视片段外,还提供国外讲座等真实语料。教材的难度区分和内容设置能够满足不同高校的师生对教材的再次开发,提高教材的适用性。

最后,每单元的第四部分是拓展阅读模块。英语学习应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拓展阅读的语篇是对主题文化、语言背景知识的进一步介绍。比如,Travel 单元的拓展阅读列举了北京的著名景点;Shopping 单元的拓展阅读介绍了在中国可以购买的特色产品,如丝绸、茶叶、酒、瓷器、中药等;Culture 单元的拓展阅读介绍了四大发明等。拓展阅读模块旨在进一步深挖教材的人文内涵,为外语课程思政建设提供素材,进一步培养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

在教材单元范例确定之后,笔者就着手进行教材配套在线课程的设计与制作。传统教材很难支持教材使用者进行信息化教学改革创新,因此打造新形态的教材就势在必行。教材配套在线课程设计主要依托教材本身,将教材的相关内容进行补充和扩展。笔者对不同高校尝试过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访谈,发现目前尝试混合教学形式的教师都选用的国家或省级精品在线课程很难与自己学校的学情匹配。所以,制作教材的配套在线课程是必要的。基于此,我们在教材配套资源方面不仅配备了齐全的教学课件、教师用书,并且提供配套在线课程,实现了教学载体的多元化。

3.2 作为教师:把教材设计理念嫁接到教学过程,教材是教学方法更迭的加速器

笔者制作的两门教材配套在线课程在 2020 年 1 月份全部完成并上线慕课平台。因此,真正开始尝试线上线下混合是在 2020 年的春季学期。

2020 年 1 月末,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笔者及时将混合教学方案进行了调整,确定了基于生成性学习资源的大学英语在线教学设计框架。SPOC 平台为依托慕课平台创建的校内 SPOC 平台,在线教学平台主要指钉钉直播、钉钉会议及腾讯会议,教师可根据教学活动类型选择不同的在线教学平台,交流互动工具主要以钉钉、云班课等软件为主,同时配合 QQ、微信等即时通信工具。

以《中级口语教程》Unit 2 Language 为例详细描述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每单元计划 4 学时完成,其中,3 学时为线上直播学时,1 学时为教师线上辅导。单元设计遵循“产出导向法”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的理论框架(文秋芳 2017),以三大核心环节即“驱动”环节、“促成”环节和“评价”环节为思路设计教学环节和内容。另外,为了将外语课程思政融入教学的多个环节,笔者在编写教材时增加了中国文化元素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因此,教师在使用教材时,能够做到以教材内容为依托,在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活动和教学

评价等环节融入外语课程思政元素。课程的评价方式以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比例为 50%+50%。“师生合作评价”贯穿于课前准备、课内产出和课后复习的整个过程。

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每单元具体教学环节都是通过集体备课商定和讨论的,包括课前准备、课中产出和课后复习及知识拓展几个部分。

(1) 课前准备阶段

在课程开始前,会向学生发放课程进度安排,细化到每单元的具体内容。在进行每单元教学前,还会再发一次该单元的学生任务清单。表 1 为《中级口语教程》Unit 2 Language 学生任务清单。

表 1 《中级口语教程》Unit 2 Language 学生任务清单

学习目标:		
1. 学生能够总结并讨论学习一门外语的好处。		
2. 学生能够就如何学习一门外语的话题进行讨论并陈述个人观点。		
3. 学生能够掌握本单元中的重点单词、句型和习语。		
4. 学生能够讨论并解释汉语在国际上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		
本单元第一次授课前任务清单	是否完成	完成时间
1. 请在 SPOC 平台上完成 Unit 2 Language 在线课程,并做好笔记。		
2. 扫描教材中词汇与表达部分的二维码,跟读该部分,并录音上传至“云班课”词汇与表达录音任务,在上课前完成互评。		
3. 请根据教材中 Word Bank 提供的单词完成习题,并完成“云班课”上的讨论。		
4. 请完成教材中的讨论题,将个人陈述文本发送至“云班课”讨论群,并录制个人陈述视频,上传至“云班课”个人陈述视频任务。任务要求:文本字数不少于 200 词,个人陈述视频不少于 1 分钟且不超过 5 分钟)。大家需要在上课前完成这部分内容的互评。		
5. 完成“云班课”中的课前学习任务反馈。		
本单元第二次授课前任务清单	是否完成	完成时间
1. 请在 SPOC 平台上完成 Unit 2 Language 在线课程,并做好笔记。		
2. 请在 SPOC 平台上完成大学英语六级模拟口语试题(一),并将自己的答案形成文本,上传至“云班课”。同时将自己的文本录音,上传至“云班课”六级口语任务中。		
3. 请在 SPOC 平台上学习 Unit 2 Language 在线课程的同时完成教材中的习题。		
4. 扫描教材上的二维码,根据教材中的对话(三)进行同伴对话练习,并录音上传至“云班课”对话练习任务。		
5. 完成“云班课”中的课前学习任务反馈。		

续表 1

本单元课后任务清单	是否 完成	完成 时间
1. 根据本单元主题,完成一个主题报告,题目是: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录制时长为 2-5 分钟的主题报告视频。任务要求:将主题报告文本发送至“云班课”主题报告任务中,并录制视频,上传至“云班课”主题报告视频任务,在一周内完成互评。 2. 完成“云班课”中的本单元学习效果反馈。		

(2) 课中产出阶段

受新冠疫情影响,本学期课程全部为线上混合,因此,笔者通过“钉钉群”或“云班课”加强与学生的线上交流和对学生的学习轨迹监控。教材使用的具体描述会以笔者两次授课的具体内容举例。第一次授课时,笔者先在“云班课”上发起词汇和翻译测试,检查学生在线课程学习的情况,然后对学生录音任务中出现的语音错误进行总结;并对学生课前在“云班课”完成的讨论给予评价和总结;之后,请学生将自己的观点形成口头陈述,分享给全班同学。笔者会对学生在“云班课”完成的个人陈述视频任务给予总结,并展播优秀学生作品。

第二次授课时,笔者在“云班课”上发起词汇和翻译测试,检查学生在线课程学习的情况,并要求学生对在线课程(外教访谈部分)陈述个人的理解。帮助学生整理本部分重要词汇和表达,带领学生借助这些词汇和表达完成教材中的三个口语任务。最后,笔者对学生在“云班课”提交的教材对话录音进行点评和总结,并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自编对话后进行角色扮演。

授课结束后布置课后任务,比如,要求学生根据单元主题完成一个视频录制,并在一周内完成互评。学生还要完成拓展阅读的内容摘要写作任务,并完成“云班课”教学效果反馈任务以便教师调整教学节奏和进度。

(3) 课后复习及知识拓展阶段

每节课除了口头任务,笔者也会通过“钉圈”布置写作任务,督促学生不断修改。学生可通过“钉圈”自动评阅给出的评语不断提高自己的语法水平与语用技巧。此外,笔者会在“云班课”或者“钉钉群”上传本节课学习重点内容及拓展资源,辅助学生做好课程相关知识的整理和储备工作,也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保障。

3.3 作为研究者:教材设计与使用的“接口”

笔者身兼教材编写者和一线教师的双重身份,因而更容易对教材使用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从而促进教材进一步的修订。从教材研究层面上,国内多从理论建构和框架设计等角度对立体化教材的开发进行研究,缺少实践层面上对立体化教材在大学英语课堂内外如何使用的探讨(杨港 2019)。因此,进一步深入研究教材使用与教学过程的交互关系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学生在教学内容

二次开发中的主体地位值得关注。

在本学期进行线上混合教学的同时,笔者注意收集学生在使用《口语中级教程》的反馈以及授课教师的教材使用意见,也对授课教师的直播视频进行了分析,发现了几个主要问题。学生层面反馈的问题有三点:第一,学生的课前任务清单完成得不够理想,部分学生没有能够按照课前任务清单的要求完成全部任务;第二,学生的课前视频录制任务完成得较好,但是文本内容出现了大段网上摘抄的文章,很少有原创内容,也有学生反馈课前任务过多;第三,学生线上互动环节较好,大部分学生反馈教材中任务设置的难度适中,但是部分学生反馈跟不上教师讲授速度,完成练习时间不够;第四,平行班进度不一,因为学生的英语口语水平差异较大,少数同学表现积极;第五,个别学生不赞同学生互评,不愿意将自己的视频作业分享给全班同学。

教师层面反馈的问题有三点:第一,教师课前工作量大于以往,因为教师需要检查学生的课前任务完成情况,在授课之前要耗费大量时间备课,如果授课的平行班超过2个,人数超过60人,则该任务几乎不能在一周之内完成;第二,教师反馈教材内容较多,部分内容对学生口语能力要求较高,这也与院校层次相关;第三,所在院校对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没有制度支持,认为此种形式的教学改革完全属于教师个人行为,对线上学时的工作量不予认定,授课教师感觉自己的额外付出不被认同,不愿意继续尝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从本学期实践情况看,虽然学生和教师普遍认为本套教程内容新颖,愿意尝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但是从民办高校学生使用情况看,教材中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设计活动虽然符合学生学习规律,但是学生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更习惯教师为主导的课堂。学生对所使用的大学英语教材总体满意度尚可,但在教材内容是否激发学习兴趣、能否保证学习的可持续性方面评分较低(郭燕、徐锦芬 2013)。另外,高校制度的欠缺导致教师的动力不足,混合式教学增加的教师隐性工作量不被承认;同时,如果高校英语口语课班级学生人数多,教师也很难及时完成对学生作业的评价。教师使用教材的行为及其背后的动机具有动态性,而动机的形成受到个人及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徐锦芬、范玉梅 2017),因此,对教材使用主体的能动性研究必将是未来外语教材研究的新方向。

4. 讨论与启示

本文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均有从事外语教材编写、外语教学以及相关研究工作的经历,二者从上述三个视角出发共同讨论教材编写、使用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4.1 教材编写与教材使用的对接

教材的使用效果是外语教学有效性的评估指标之一。有效的课堂教学强调“教师对教材的再开发和再利用,选取和挖掘与教学目标相匹配、与教学设计相适应的教学材料”(朱彦 2013)。外语教师要树立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的教

材观,在准确把握编写意图基础上增强使用教材的创造性,通过多种途径不断提升对教材二次开发的能力。这是提升教材使用质量的有效策略。根据 Harmer(2007: 51-58)提出的有效外语教学应采取的“有原则的折中主义”(principled eclecticism),笔者认为,实现外语教材有效使用的途径有多种,但必须始终坚持学生接触目标语、激发和保持学生学习兴趣、创设使用目标语的机会等原则,并承认不同学生对不同刺激的差异性反应。何善亮(2010)以学生能力发展为目标、以学生有效学习为中心、以建立生本课堂为途径构建了有效教学的实践框架,这为立体化教材在外语教学中的有效应用提供了理论参考。立体化教材在编写时嵌入了多元化技术手段和多样化信息资源,为外语教学效果的提升夯实了基础。教材编写理念的先进性如何转化成教材使用的有效性?具体而言,立体化教材整合了教学资源,优化了教学环境,为学生实现有效学习创造了物质条件;通过音频、视频、图文、视听一体的场景,从多个角度对学生的感官形成刺激,加速和改善了信息解构与认知,为促进学生把学习中的外在体验内化为能力发展提供了可能;立体化教材的使用主体是学生,课堂内外的学习均以满足学生需求为中心,创设了“以生为本”的教学氛围。

4.2 教材新形态与教学新常态的对接

数字时代外语教学范式已由“知识获取”转向“知识创建”,静态、预设的教学资源多是单向输送知识的载体,无法满足学生差异化和个性化学习的需要,学生与资源之间没有交互的空间和渠道。立体化教材把纸质界面的知识体系延伸至全新的数字环境中,创建与学生个体因素相匹配的教学资源体系,推动高校外语教学形成“常态化在线课堂、泛在化自主学习、智能化组织管理”相结合的新生态(杨港、陈坚林 2018)。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课堂教学新生态的本质是利用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信息技术,构建数字化资源驱动的课堂教学环境,采用多样化的教学和学习方式,开展多元互动的教学和学习活动,做到精准教学,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发展需求(张伟平等 2020)。以立体化教材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教学资源作为这一新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联结个性化资源推送和个性化精准教学,一方面互联网、在线课程等为学生提供便捷的资源获取渠道,另一方面参与式、探究式、合作式教学支持教师和学生充分利用优质资源提升教学效能。为此,教材编写与在线课程建设协同发展,旨在方便教材使用者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助力高校教师打造线上线下混合式金课。

4.3 技术的“常态化”与教材编写、使用、研究的对接

由于多媒体和网络等技术完全融入大学英语教学,支持立体化教材的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不再被视作独立的新事物。立体化教材的广泛使用使计算机信息技术不再只是承担辅助外语教学的任务,而是已经成为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技术支持的外语教材推动了教学向个性化、整合式、精细化方向发展。但是,生硬的技术融入不仅起不到促进作用,还会阻碍师生能动性的发

挥,破坏教学生态的平衡,影响立体化教材的编写、使用、研究的整体效果。对教材编写而言,鼓励外语教材通过信息技术推送阅读和视听资源,设立平台分享阅读和视听的成果,为教材使用者提供在线分享、研讨教材内容的机会和环境,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因此,教材编写要把握“有利于师生运用多种媒介和信息技术呈现学习内容”的原则,依托教材建设丰富的数字化资源库,使信息技术成为外语教材编写的内生力量。就教材使用而言,外语教学中使用纸质教材和数字资源一体化设计的立体化教材可以提高教学资源的使用效率,为语言交际环境和智慧教学环境的形成创造有利的条件。教材依托数字平台和二维码等网络技术,建立了纸质教材和数字资源的有机关联,与教材配套的移动端APP为实现外语学习的泛在化和师生交流的即时性提供了可能。对教材研究而言,立体化教材是要充分利用现代技术的强大功能,将先进的外语教学理念和方法落实到教材的编写和使用中,在“兼容、动态、良性”的环境中实现计算机网络与外语课程的生态化整合。陈坚林(2015)认为基于大数据的外语教学具有三大优势,即:使个性化学习成为可能、能够真正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和使新型课程设计与混合式教学成为可能。外语立体化教材在设计理念和研发过程中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将全面影响和改变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那么在立体化教材应用于外语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如何理顺大学英语课程体系内部的各种因素之间以及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技术的“常态化”(normalization)(Bax 2003)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5. 结语

本文以教材编写者、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身份阐述了教材编写、使用、研究的经验,讨论了教材编写与教材使用如何互相关联并协同发展、教材新形态与教学新常态如何共同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需求以及面对信息技术“常态化”,教材的编写、使用、研究如何形成合力等问题。本文把自传式叙事研究方法引入外语教材研究,虽然叙事研究在案例丰富性、时间延展性和空间开拓性等方面存在局限,但作者对真实经历的细致讲述和故事内涵的自然解读揭示了有关外语教师编写、使用和研究教材的总体情况,对相同或相似教育情境下教师编写教材、从事教学和开展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Bax, S. 2003. CALL—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System* 31(1): 13-28.
Harmer, J. 2007. *How to Teach English* [M].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Kervin, L. & B. Derewianka. 2011. New technologies to support language learning [A]. In B. Tomlinson (ed.),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iti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28-351.
McDonough, J., C. Shaw & H. Masuhara. 2012. *Materials and Methods in ELT: A Teachers Guide* (3rd edition) [M]. London: Blackwell.

- McGrath, I. 2002. *Materials Evaluation and Design for Language Teaching*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Motteram, G. 2011. Coursebooks and multi-media supplements [A]. In B. Tomlinson (ed.), *Materials Development in Language Teaching* (2nd edition)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3-327.
- Pavlenko, A. 2007. Autobiographic narratives as data in applied linguistics [J]. *Applied Linguistics* 28(2):163-188.
- Reinders, H. & C. White. 2010.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chnology in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task design [A]. In N. Harwood (ed.), *Materials in ELT: Theory and Practice*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8-80.
- Saraceni, C. 2003. Adapting courses: A critical view [A]. In B. Tomlinson (ed.), *Developing Materials for Language Teaching* [C]. London: Continuum. 72-85.
- 安桂清. 2019. 教材使用的研究视角与基本逻辑[J]. 课程·教材·教法(6): 69-74.
- 陈坚林. 2015. 大数据时代的慕课与外语教学研究——挑战与机遇[J]. 外语电化教学(1): 3-8, 16.
- 郭燕、徐锦芬. 2013. 我国大学英语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研究[J]. 外语学刊(6):102-108.
- 何善亮. 2010. 论有效教学的实践建构[J]. 课程·教材·教法(5): 20-26.
- 李思龙. 2017. 大学英语 ESP 教材编写实践与反思[J]. 山东外语教学(1): 55-62.
- 李学. 2008. “教教材”还是“用教材教”——兼论教材使用功能的完善[J]. 教育发展研究(10): 82-85.
- 刘道义. 2020. 论影响外语教材建设的重要因素[J]. 课程·教材·教法(2): 64-71.
- 邱德乐. 2009. 论教材的“三次开发”[J]. 全球教育展望(12): 24-27, 23.
- 饶国慧. 2020. 基于混合式学习的教材出版融合创新之路[J]. 出版广角(5): 53-55.
- 王玲. 2018. 大学英语教材出版现状与展望[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4): 10-12.
- 文秋芳. 2017. “产出导向法”教学材料使用与评价理论框架[J]. 中国外语教育(2): 17-23, 95-96.
- 徐锦芬、范玉梅. 2017. 大学英语教师使用教材任务的策略与动机[J]. 现代外语(1): 91-101, 147.
- 杨港、陈坚林. 2018. 突破大学英语教学质量的瓶颈[N]. 社会科学报(3-29):05.
- 杨港. 2019. “立体化教材+互联网资源”驱动的大学英语教学设计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1): 23-29.
- 杨港. 2020. 大学英语立体化教材研究: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杨敏、侍怡君. 2020. 基于文化与功能视角的英语教材评价框架构建[J]. 当代外语研究(3): 57-67.
- 俞红珍. 2005. 教材选用取向与不同的教材观[J]. 教育理论与实践(8): 42-44.
- 张青妹. 2015. 微媒体语境下外语数字化教材编写策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3): 82-84.
- 张伟平、陈梦婷、赵晓娜、白雪. 2020. 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课堂教学新生态的构建[J]. 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 9-17.
- 张雪梅. 2019. 新时代高校英语教材建设的思考[J]. 外语界(6): 88-93.
- 郑晓红. 2018.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教材评价研究——与 Michael Byram 教授的学术对话及其启示[J]. 外语界(2): 80-86.
- 朱彦. 2013. 提高外语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关键因素[J]. 外语界(2): 50-58, 68.
- 曾家延、崔允灏. 2019. 学生使用教科书研究:教材研究的新取向[J]. 课程·教材·教法(11): 67-74.

(责任编辑 邓梦寒)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ethnic minority literature as “cultural discourse” in the cultural,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network.

Translating the Last Sentence in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Light of Cohesion and Coherence, by WU Jianguang & NIE Xinlei, p. 64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of the last sentence in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Proletarier aller Länder, vereinigt euch !” (English version: 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 has always been controversial, because it is interpreted in multiple ways. To understand this sentence, one should begin with such aspects as rhetorics, metrics, text linguistics, and Marxist philosoph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ertextuality, cohesion and coherence of the concept of “unification” in the text, and the contrasting rhetorical form of “all” and “one” in the last sentence. We assume that the prevailing Chinese translation “Proletarians of the whole world, associate !” could be alternatively rendered into “Proletarians of all countries, unite !”.

An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Inquiry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Research at the Tertiary Education Level in the Digital Age, by YANG Gang & PENG Nan, p. 96

Abstract: The paper intends to illustrate the experiences of engaging in compiling, using and research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aterials (TMs)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a compiler, teacher and researcher, and draw implications on several issues arising in that process. The study adopted an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approach. Data were collected through the author's memoir of events, focusing on summarizing and reflecting on the compilation, use and research of TMs. Based on the narrative of the auth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Ms compilation and u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w forms of TMs and new ecology of teaching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compila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TMs are discussed. It informs and offers measur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TMs in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